

當本土社會運動遇到西方的新社會運動 理論：以台灣的反核運動為例*

何明修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關切社會運動的理論建構問題，試圖從台灣的反核運動來反省西方的新社會運動理論。新社會運動理論宣稱，六十年代以後出現的各種社會抗議是在性質上不同於以前。這些新興抗議議題反映了晚近資本主義的社會變遷、劃分了新的政治對抗軸線、並且集體追求新的價值觀。然而，在台灣發展脈絡中，反核運動是與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密切相關。反核與擁核的社會分歧大致上符合政黨認同，反核者所追求的也是政治民主化的進一步延伸。因此，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本土適用性是值得懷疑的。台灣社會運動的研究者需要更注意本土的脈絡性，避免過度被西方理論所牽制。

關鍵詞：新社會運動理論、反核運動、政治分歧、民主化

* 本文初稿發表於「第三屆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研討會」研討會，嘉義大林，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暨社會學研究所，2002年4月12日。本研究經費由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NSC 90-2420-H-343-001)補助，感謝助理顏妙娟同學的校正。筆者感謝林本炫、黃庭康兩位老師、匿名審查者的指教意見。

一、 西方理論與本土社會運動的研究

在一篇反省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文章中，張茂桂(1994)指出，直接借用國外的理論是危險的，因為許多看似中性的描述性概念都預設了歷史背景，很難橫向地移植至不同的社會脈絡。儘管如此，近十年來仍然沒有任何研究作品具體指出，為何直接套用是不宜採行的研究策略。在這段期間內，隨著國內政治民主開放，社會運動的日益走上制度化(何明修 2003b)，學術界對於集體行動的興趣逐漸淡化，張茂桂所提出的警告也沒有被進一步討論。

在此，本文討論新社會運動理論(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與其在台灣的適用性。簡單地說，新社會運動理論是一套源自於七十年代的歐洲觀點，強調生態、和平、婦女等運動的出現代表了一個新的社會形態出現。環境與性別等議題構成了所謂的「新政治」(new politics)，與過去的階級鬥爭、民族主義等各種政治衝突有明顯的不同價值關懷、參與方式與作用。一些研究者強調，要分析這些新興的社會現象就需要建構新的理論視野。他們共同反對美國社會學界的普遍觀點，認為社會運動只不過是一種常態政治，可以透過組織、動員、利益等概念來加以理解。在台灣的社會學界，「社會力」、「民間社會」、「自主性」、「反支配性格」等概念是常被借用來分析本土的社會運動(蕭新煌 1989a, 1989b, 1990；蕭新煌等 1995)。事實上，這些概念也是來自於新社會運動理論，被選擇性地引介進入本土的社會學論述之中，成為通用而流行的詞彙。

很明顯地，相對於美式的社會運動研究，新社會運動理論是有其吸引力的。自從八十年代末期以來，台灣的運動界與同情社會運動的學界就是關注所謂的運動自主性的問題(何明修 2003a)。雖然這個概念的實際內容從來沒有清楚釐清，或是被普遍接受(參考張俊宏等 1989: 88-91；戰爭機器 1991: 275-283)，自主性一直是不同路線的爭議焦點。在此，新社會運動理論提供了一個新穎的參考座標，當時關切社會運動發展的台灣知識界借用觀點，強調社會運動不能化約成為反對運動、統獨爭議等。另一方面，新社會運動理論重視認同建構，

而非策略、交換等工具性的行動，也因此更能夠吸引理念取向的知識份子。因此，對於台灣社會運動而言，新社會運動理論的命題已經不再只是純粹的理論描述，實際上，它已經介入現實的運動發展，並且相當程度地影響了其日後的走向。

儘管如此，理論與現實的分別仍然是十分明顯的，可以進一步詳述其差異所在。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在於，到底新社會運動理論本身是否能適用於台灣的歷史脈絡？本文計劃以本土的反核運動作為例子，指出它不合理的理論預測之處。基本上，我們認為局部性地借用國外的理論模型固然有其優點，也有「不合國情」的缺憾。因此，一個可行的本土社會學分析策略即是，回到台灣的歷史軌跡，建構一套注重本土特殊性的解釋模型。

二、新社會運動理論

六年代的社會抗議重新引起大西洋兩岸學者對於社會運動的重視，研究者開始試圖尋找一種新的分析途徑，思考抗議活動背後的社會學意義。在此之前，社會學界主要是以「相對剝奪理論」(Gurr 1970)、「群眾社會理論」(Kornhauser 1959)、「集體行為理論」(Smelser 1959)、「傳染理論」(Le Bon 1995)等觀點來看待社會運動，基本上認為它是一種偏差行為，是源自於社會秩序崩潰的結果。一句話，這些理論都是屬於 Tilly 所謂的「社會解組模型」(breakdown model)，主張集體行為反映了社會秩序的解組，其本身不能帶來任何的正面助益，或是真正地改造社會(Tilly 1978)。新一代的研究者很多人本身就是參與了社會運動，自然不滿意這種保守主義偏見。在美國，七十年代以來的社會學者開始以利益政治的模型重新審視社會運動。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學者從組織社會學出發，他們將研究的焦點定位於社會運動組織，分析這種組織如何常態地進行支持者動員、資源匯集、議題宣傳等活動(McCarthy and Zald 1987)。從這種角度來看，體制外的社會動員與體制內的國會遊說、利益交換、政治聯盟、公關宣傳等活動並沒有不同，都是常態政治的延伸。從這個重

大的觀點突破出發，美國後續的研究者不斷地深化資源動員論的發現。一方面，有些學者開始專門分析政治體系與社會運動的互動關係，強調所謂的政治機會概念可以用來解釋社會運動的興起與發展，這即是所謂的政治過程論(McAdam 1982; Tarrow 1989a)。另一方面，有些學者也開始注意運動團體如何進行所謂「共識動員」，也就是以議題與理念的宣傳來取得更多人的同情與支持，這種探討方式的關鍵概念即是「認知框架」(framing)(Snow et al. 1986)。

簡單地說，美式社會學的作法是將社會運動重新定位為一種正常的現象(business as usual)，側重其中的策略考量與利益計算之面向。在大西洋的另一岸，新一代的學者則是採取另一種的研究途徑，他們重新取援於古典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架構，以理解當時的新興社會抗議。馬克思主義指出鉅觀的社會變遷(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何種的結構條件(無產化、剝削)會創造出新的行動主體(無產階級)的。其中，行動者的觀念(階級意識)是重要的，因為階級鬥爭的戰場也延伸到文化的領域(意識型態)。同時，他們關心集體行動的時機與形式(社會革命)，並且設想行動所指向的未來狀況(社會主義)。歐洲的新社會運動論者並不一定接受馬克思的理論預測，事實上，他們往往認為工人已不再是革命階級，工人運動已經是被現代資本主義所制度化了。儘管如此，他們都相信結構與文化分析的優位性，因此，相對上較不重視美國社會學的組織與政治分析。就這一點而言，Tarrow 指出：「如果說美國人是受到理性選擇理論的影響，反對古老的集體行為理論傳統，那麼歐洲人就是更本能地觀察現代資本主義的改變，反對他們傳統上對於工人階級的執著」(Tarrow 1989b: 57)。

在此，我們並不企圖討論所有新社會運動理論的細節，而是側重於其中的主要論證，即 1/社會結構的變遷如何促成新政治的出現；2/新政治的社會分歧；3/新社會運動提出了何種的文化價值；4/新的集體行動參與。

1. 新的社會結構

新社會運動理論者總是將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放在一起來思考。他們要為社會運動去污名化，其論證方式與資源動員論者有顯著

不同，他們不試圖將社會運動視為一種順從利益邏輯的集體現象，反而是強調社會運動作為現代社會變遷的源頭。前現代的抗議並不是所謂的社會運動，因為他們很少自覺地要改變既有的社會規則。相對於此，「在現代社會中，社會運動正好位於變遷產生的位置。因此，它們首度能夠扮演社會創造的歷史角色」(Eder 1982: 10)。基於相同的理由，Alain Touraine 用「歷史性」(historicity)這個概念來描述社會運動本身所具有的改造能量，能夠從舊社會的母體中孕育新社會的胞胎。歷史性的概念指出了一個事實，社會並不只是它所表面呈現的那樣，而是不斷地產生矛盾與進一步辯論發展的關鍵。針對社會運動與變遷的密切關連，Touraine 的學生 Alberto Melucci 進一步指出，社會運動具有社會預言的性格，往往是一種針對未來狀況的集體投射：「他們事先宣佈正在成形的事物」(Melucci 1996:1)。

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工業無產階級一方面是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新興社會力量，另一方面，也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宣告社會主義的到來。同樣地，對於新社會運動研究者而言，社會運動一方面起源於社會矛盾，亦即是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緊張關係，另一方面，也促成社會變遷的推手。因此，這些研究者有必要提出一套鉅觀的結構理論，來分析新社會運動的出現原因。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是，為何古典的工人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政治民主運動逐漸喪失動員能量，而新興的婦女、環境、和平等議題卻從走出少數知識精英的範圍，成為集體參與的公眾議題？一句話，新社會運動如何取代了舊社會運動？

就這一點而言，André Gorz 所提出的「告別工人階級」基本上是所有新社會運動理論者的共同看法。Gorz 認為，在後工業社會的年代之下，進步運動不再是附著於傳統的工業無產階級，試圖以一種經濟體制來取代資本主義。越來越多人的工作是間歇性的，或是在勞動力市場中被低估的，這些所謂的「後工業新無產階級」將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新一波的左派運動將不是不同政治經濟學之間的對抗，而是要限制經濟邏輯對於人們生活的侵佔，並且重新從工作以外的領域建構生命的意義(Gorz 1982: 84-9)。

對於 Touraine 而言，解答問題的關鍵在於後工業社會的興起，知識生產越來越成為社會的主軸，開始取代了過去的經濟生產過程中的

勞資對立。文化成為社會衝突的主要場所，經濟衝突成為次要的。因此，Touraine 認為無產階級不再是扮演馬克思所預期的革命角色。他強調，晚近的工會已經退化成為一種純粹的利益團體，不再試圖積極改造經濟與社會資源的重分配，而只是消極地保衛既有的利益。因此，不能再算是一種社會運動(Touraine 1986)。相對地，學生、新中產階級成為了後工業社會的運動主力份子，原因正在於他們是直接涉及了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掌握後工業化社會自我生產的關鍵。因此，對於 Touraine 而言，新時代的階級鬥爭不再是涉及剩餘價值佔有的生產領域，而是存在於「工作以外的生活」，或者是說是「消費」的領域(Touraine 1977: 163-163)。

Jürgen Habermas 也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晚近資本主義的演變。他指出，晚近資本主義的特色在於國家介入經濟體系，為了避免資本積累的危機惡化，社會福利的政策改變了市場分配的結果。如此一來，階級對立不再是晚近資本主義的的組織原則，社會矛盾的主軸也從經濟體系轉移到社會文化體系，出現了所謂的正當性危機。對於 Habermas 而言，經濟財富是可以透過政府規劃創造出來，但是文化的意義卻是一種無法被管理與生產的資源。主政者為了說服公民接受現有的秩序安排，他們利用傳統的文化觀念，或是假借現代科學的權威。因此，文化本身成為爭議性的，導致「一些過去被歸為私領域的生活面向之政治化」(Habermas 1975: 72)。Habermas 認為，正當性危機就是表現在傳統價值受到質疑，新的群眾參與開始出現。簡而言之，新社會運動論最主要的理論宣稱就是新舊社會運動的差異，不同的集體行動模式反應了社會變遷的軌跡。無論是後工業社會理論、或是晚近資本主義理論，都宣告工人運動的終結，並且期待從文化領域看到新的抗議風潮。

2. 新的政治對抗軸線

從政治傾向來看，新社會運動經常被稱為「左派反威權的」(left-libertarian)，一方面他們是左派的，不相信市場與資本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們是也反威權的，反對官僚對於個人生活的控制，要求直

接民主與社群的自主性(Kitschelt 1990: 180)。從這個角度來看，新社會運動是與老左派共同具有某種程度的價值親切性，尤其是對於資本主義的不信任。然而，新政治並不一定能在既有的政治市場之中找到代言人。一旦面臨了增加就業與環境保護的政策兩難情境，新政治的主張並不一定獲得體制內左派的全力背書，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新社會運動直接挑戰了老左派的社會民主信念，認為資本主義是可以被改革的。就以核能發電的問題而言，七十年代歐洲社會民主黨積極擁抱這項新科技，認為核能可以解決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這種政策必然使得新社會運動與政黨之間的政治聯盟充滿緊張的關係。因此，等到反核運動成為一股沛然的社會力量，「體制內主要政黨所形成的支持經濟成長聯盟之選舉穩定性與群眾支持都減低了，這些政黨都支持某種程度的凱因斯福利共識」(Wagner 1994:30)。此外，新社會運動對於直接參與的重視，使得他們認為傳統政黨與工會的官僚化組織方式是社會控制的一環，而不是通過社會解放的道路。

Offe 認為晚近資本主義的最大改變在於國家的介入，造成行政管理組織的高度分化與複雜化。在福利國家體制中，權力不再只是位於某一個控制高地，可以透過武力奪權或是選舉勝利，直接取得權力，並且用來改造社會。因此，新的反抗基地是在於民間社會，用 Keane(1984: 31)的話來說，「『議會路線』不能再被視為首要的，不再是佔據社會主義大業的核心舞台」。因此，新社會運動試圖疏離現代的政治部門，改以另一種方式來從事政治。

另一方面，新社會運動的出現也代表了戰後的社會分歧結構(structure of social cleavage)的進一步改變。在七十年代以前的政治對抗是以重分配政治為軸線：保守派要求保護個人經濟自由，維護市場自由運作；激進派則是要求公平分享社會勞動的果實，以社會正義限制商品化的邏輯。位於政治光譜中間的主流政黨則是試圖以經濟成長來作為政治宣傳的最大公約數。新政治以體制外社會運動的形態出現，而且持續地向主流政治提出強而有力的挑戰，這個事實就代表了，體制內的政黨與常態政治之吸納能力正在消退之中(Offe 1990:233)。誠如 Kriesi(1999)所指出的，九十年代的歐洲不再只存在經濟自由與社會正義的主要對抗軸線。在新右派運動(例如仇外、反

移民的種族主義)中，可以發現不少的低下階級與失業工人，同樣地，若干教育程度高而收入也較多的專業人士也傾向於支持新左派運動，例如綠黨與環境運動。這些現象共同顯示了一點，新政治的社會基礎與舊有的社會分歧格格不入，憑藉其廣泛的社會動員，一個新的政治勢力版圖正在重新劃定。

3. 新的文化價值

誠如 Touraine 所強調的，「社會運動之所以激起熱情，正是由於行動者是由他們的文化導向所界定的」(Touraine1985: 78)。因此，沒有理念層次的導向，社會運動就不存在。一個應該追問的問題即是，新社會運動到底要追求何種文化價值？

關於這個問題，批判理論的學者提出最完整的說明，他們共同認為新社會運動的使命在於實現未完成的現代性，保衛現代化的溝通理性以防止系統力量的介入與扭曲(Eder 1982:11; Kriesi 1988: 356; Rucht 1988:316)。無疑地，這個看法是來自於 Habermas 對於現代社會的診斷，也就是所謂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命題(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在他看來，由於社會演化的開展，系統得到了免於規範節制的運作自由，使生活世界的自由溝通受到限制，語言的媒介被非語言媒介所替代。因此，許多生活的事務決定越來越不是眾人共識的結果，而是純粹的功能要求。系統施加結構暴力於生活世界之上，使生活世界喪失了自主性。造成這種畸型發展的兩種系統媒介就是貨幣與權力，分別體現在自由市場與現代國家官僚，當前的生活世界是在兩者間之夾縫中求生存，溝通理性的基礎則是被一步步侵蝕(何明修 2001a)。基於這個理由，這些研究者強調，社會運動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參與，拒絕生活周遭的各層面被納入管理，使得人民不再有發言與決定的權利。透過更草根的政治參與，自主性與團結的價值被提出來了，他們所要對抗的則是國家部門的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的模式，將和平、環境、性別、人權等議題去政治化，成為行政管理的事項(Cohen1982)。

需要強調的是，批判理論的學者並沒有為所有的新社會運動背

書，事實上，他們對於若干「激進的」基本教義立場抱持保留的態度。Habermas 認為新政治議題是抗議異化的生活世界，意圖重建免於資本主義支配的自主性生活。但是他對於新社會運動解放潛能仍持保留的態度，因為它們仍具有一些反普遍主義的元素，與溝通理性的預設相衝突(Habermas 1987 391-6)。同樣地，Touraine 也批判西方生態運動中的浪漫主義傾向，試圖回到一個「前基督教的、泛靈論的自然化」，其結果無疑是導致「一種綠色基本教義主義，某種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式的生態神權統治」(Touraine 1999:49-50)。很顯然，在晚近的新社會運動浪潮之中，有若干價值取向並不是溝通行動理論所能掌握或是接受的。就以我們所關心的環境運動而言，運動者固然是要保衛社區的自主性，反對權力與資本的任意侵入。他們批判現代工業社會中的科技理性，但是其目的並不一定要重新恢復某種現代性中的價值，例如 Habermas 所謂的溝通理性。事實上，與其說新社會運動是在保衛某種固有的理念，不如說他們是在建構一種新的價值觀。

誠如學者所指出的，西方環境運動的主流方向是建構一套「新環境典範」(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強調生態均衡、愛惜地球、平等合作等價值觀之重要性。運動的目標在於，使所有人都能過著親近自然的簡樸生活(Milbrath 1984; 1993)。基於這種價值觀，西方的環境運動常被認為與新中產階級密切相關，因為他們是歷史上第一群能夠免於物質匱乏，而又具有高教育程度的世代。新中產階級重視生活品質，將財富積累視為等而次之的目標，這種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的態度就是支撐環境運動的主要動力(Inglehart 1981)。也因此，質的問題開始取代量的問題，人們關切的不再是生活水準，而是生活品質。

新社會運動也提出了一套新的文化價值，一方面重新肯定生活社區的自主性，反對政治權力與資本的任意入侵；另一方面則是批判充滿緊張的工業文明，要求重新改造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

4. 新的集體行動參與

舊社會運動是以國家為中心的，試圖取得權力的制高點，以推動民族解放，或是建立社會主義。在舊社會運動的圖像中，社會體系的內部有個權力核心，外頭則是有統治階級所設下的重重關卡。因此，要實現運動目標就要佔據這個權力核心，驅趕舊有的統治集團；要取得權力，社會運動就要組織起來，匯集人力與資源以形成一股更龐大的社會力量。無疑地，舊社會運動所形成的工會、政治團體、政黨就是這種邏輯下的產物。然而，從新政治的角度來看，這種策略將會面臨重重的困難。一方面，為什麼要建構一個內部充滿支配關係的組織，來挑戰外在的支配結構？難道這種路線不會面臨「手段與目的之諄論」，爭取自由的手段反而造成了新的奴役？新社會運動反對科層化的組織模型，拒絕領導者與追隨者的角色制度化，要求普遍而直接的參與。因此，「諸訴於自發性、反威權主義、反對層級」即是當前集體行動的主要形式(Melucci 1996: 103)。

其次，舊社會運動將批判的焦點放在結構性的議題，他們揚言改造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威權統治，但是卻忽略了其他更為微觀的、日常的議題。免於公害污染的生活品質、免於核武威脅的安全、沒有性別歧視的工作場所，這些訴求都是日常生活都時時接觸的議題，也是新社會運動的抗爭訴求。隨著批判的焦點轉移，新社會運動所追求的也不再是徹底的政經結構改造，並不是再追求某種的公民權，而是將日常生活進一步民主化(Melucci 1988: 247)。Offe(1984: 173)就曾強調，新社會運動拒絕政黨政治的邏輯，而採取議題式的抗爭策略。對於這些學者而言，新政治的策略轉向並不是一種退步。新社會運動尊重既有的制度邊界，不挑戰資本主義民主的正當性，但是他們仍是從事某種意義下的根本改造，這也是為何學者將這一類型的社會運動稱之為「自我設限的激進主義」(self-limited radicalism)(Cohen and Arato 1994)。

新社會運動將日常生活視為社會衝突的場域，他們善於利用文化與媒體的力量，來壯大自己的聲勢。對於研究者而言，這代表一種新浮現的社會參與形式，運動者不再只是進行政治動員或是群眾組

織。於是，認同的形塑就成為了新社會運動的核心議題之一。對於認同的問題，新社會運動學者十分堅持這一點，他們認為運動不只是被視為一種純粹的政治性現象，只是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或是權利的賦與。在這種政治中心論的觀點下，文化往往被化約成為動員的工具。這些學者強調，文化改造本身往往就是運動的目標(Melucci 1994: 107)。因此，生態運動者不只是一要修正放任資本積累的國家政策，更是要形塑一套實用生態倫理，希望能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化認同本身就是新社會運動的一部分，也是最受重視的社會參與方式。換言之，新社會運動強調的是認同建構，而不是在於政治策略(Cohen 1985)。

簡單地說，新社會運動理論是一套涵蓋內容十分廣泛的解釋模式。與美式的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認知框架理論相比，他們並沒有宣稱自己的研究法是中立的，可以解釋任何一種的集體行動。但是針對晚近以來的新政治議題，他們卻堅持自己的觀點比較貼近事實。在一篇富有啟發性的文章中，Calhoun(1993)批判新社會運動理論過於強調晚近社會運動創新性格，並且不當簡化了以往的社會抗議。他指出，十九世紀初的各種民族主義、宗教復興、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神祕主義等運動都是具有豐富的特色，而不只是單純的政治現象。這些特色包括了，(1)強調認同、自主與自我實現、(2)防衛性而非攻擊性、(3)日常生活的政治化、(4)非階級取向或說是中產階級動員、(5)拒絕工具與目的劃分、(6)非傳統的手段、(7)局部的與重疊的參與等特徵，因此，也應該要稱為「十九世紀的新社會運動」。Calhoun的本意是強調，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核心命題是有問題的，即使是放在西方的發展脈絡下，也是一種錯誤的描述。

在此，本文的關切是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本土適用性。在本土的研究作品中，這些觀點經常被零碎地借用，並且用來說明台灣社會運動的某些面向。新社會運動理論本身就是充滿啟發性，有許多值得進一步發揮與深究之處。事實上，這些研究者對於自己作品的時代性格與地域性是具有高度自知之見的，難道直接套用若干論點於本土事實，不會出現問題嗎？再且，借用國外發展完備的理論，固然有助於

研究者著重一些本土運動的面向，然而這是否會造成若干特殊的運動面向反而被忽視了？一句話，到底台灣的反核運動是不是一種「新社會運動」，這將是我們接下來的問題。

三、 台灣的反核運動與新社會運動理論

台灣最早的核能政策辯論是出現於 1979 年 7 月的《中華雜誌》，當時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林俊義著文批判台電的核能政策。不久，一位原能會的工程師¹也刊登了一篇回應文章，反駁新興反核的論點(何明修 2001b：120)。在這個時候，台灣早就走入了核能發電的年代，核一、核二、核三廠計劃都已經付諸執行，而引起龐大的抗議風潮的核四案則是正在積極籌劃之中。從文字反核到行動反核，轉眼間台灣又過了九個年頭。在 1986 年 10 月 10 日，黨外編聯會動員群眾到台電大樓進行示威，反對核四廠的興建，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的公開反核抗議活動(見《新觀點週刊》(1986)，第 28 期，頁 8)。也正是在解嚴前後，民間社會勃然興起的年代，台灣的反核運動正式成形，成為一股要求改變現狀的集體力量。在核四議題之後，恆春反對核三廠(1987 年 3 月)、蘭嶼反對核廢場(1988 年 2 月)、金山反對核二廠(1988 年 3 月)等抗爭主題相繼出現。除了抗議事件的出現以外，新生的反核力量也展現在組織集結，新環境雜誌社 / 新環境基金會(1985)、雅美青年聯誼會(1987)、新環境主婦聯盟 / 主婦聯盟基金會(1987)、環保聯盟(1987)、綠色和平(1987)、鹽寮反核自救會(1988)。

很顯然，台灣的反核運動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逐漸形成，並且持續地在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關鍵時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現在我們的問題則是在於，這一股社會力的興起是否符合新社會運動理論的預測？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要從社會結構、政治對抗、運動價值、運動參與等面向來加以討論。

¹ 該文作者當時任職於原能會教育處，專門負責輿情工作，因此撰寫反駁文章也是他的工作。訪談記錄，2003 年 11 月 11 日。

1. 何種社會結構的變遷？後工業社會、晚近資本主義抑或是民主化

無疑地，新社會運動理論的基本洞見是正確的，集體行動的風潮是由一股結構力量所推動。在台灣的例子中，反核運動與其他當時新浮現的抗爭議題都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威權資本主義的結構緊張(徐正光 1991；Bello and Rosenfeld 1990)。然而，這種社會變遷可以用 Touraine 的後工業社會理論，或是 Habermas 的晚近資本主義理論來理解嗎？在新社會運動理論之中，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基本上被認為是發展完備的架構，選舉與政黨競爭的遊戲規則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因此，這些理論者借用歷史唯物論的分析架構，將社會變遷的源頭放在經濟體系，新的經濟制度造成了文化體系的矛盾，從而引發新的集體參與壓力。然而，放在台灣的發展脈絡中，這樣的理論預測是十分有問題的。首先，八十年代中期的台灣是否可以用後工業社會或是晚近資本主義的概念來解釋，仍是一個值得存疑的問題。即使是放在當今的社會狀況，我們仍不能說，台灣的文化生產已經取代了製造業生產，或是福利國家的政策已經發展完備，並且改變了資本積累的邏輯。其次，誠如批評者所指出的，新社會運動理論並沒有認真處理結構變遷是如何造成集體行動者的出現。缺乏經驗層次的解釋能力使得新社會運動理論流於空洞，將集體行動的發展化約成為社會變遷的直接後果，一句話，這是「大而無當的理論」(grand theory)(Tarrow 1989b: 62)。因此，即使勉為其難地指出了台灣的後工業或晚近資本主義之特點，仍是無法說明這些結構特點如何導致了抗議行動的產生。

更重要的，新社會運動理論是高度附著西方社會的發展經驗，基本上將政治體系認為是穩定的背景條件，並沒有將政治民主體制本身視為一個問題(problematize)。然而，在本土的研究作品之中，許多學者將解釋反核抗議的風潮放在政治過程中，也就是國民黨威權體制的緩慢瓦解過程如何提供了反對者有利的政治機會。八十年代以來的國家控制力減弱、公共領域自主化、媒體的多元化都是被用來說明反核運動興建的關鍵(張茂桂 1989；張茂桂等 1992；林碧堯 1994；李丁讚與林文源 2000)。事實上，如果脫離了民主化的結構條件，整個

台灣的反核運動歷程便無法理解。舉例而言，在八十年代初期，反核意識只限於一小群的知識精英，他們有能力閱讀英文的核能文獻，並且與國內的官員對話。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核能開始擴大成為中智階層、民意代表所關切的問題。早在核能議題成為一股動員基層群眾的力量之前，許多民間座談會、電視辯論會、立法委員質詢與報導文學作品就將焦點放在核電風險。從精英之間的對話轉變為社會啟蒙的集體過程，反核意識的普及化就是台灣威權體制解組過程中的一環。誠如林俊義向筆者所透露的，在七十年代末期要出版一篇質疑核能政策的文章是十分困難的。他指出，當時自己的一篇反核作品使得某一個雜誌被政府查禁。²很顯然，不管統治者的意願如何，威權政府控制言論能力的衰弱是重要的因素，反核知識份子獲得很大的發揮空間。一直在國民黨宣佈解嚴之前，反核言論不斷地挑戰、質疑威權體制的公信力。無疑地，解嚴前的反核意見領袖扮演了公眾啟蒙者的角色，直接促成了解嚴後的反核運動之群眾化。

從以上的說明，我們試圖指出，新社會運動理論的結構分析並不能說明台灣反核運動的出現，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對於政治民主化過程的忽略。事實上，許多學者都指出，民主化的結構動力是造成晚近二十年來台灣各種變遷的最主要來源。從民主化角度來看，我們也認為西方理論所主張的新／舊社會運動之分別是不符合本土的經驗事實。

根據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說法，我們很容易地區分三個時期的社會動員，首先是政治運動，結果促成了民主政治。其次是勞工運動，一方面促成了工人獲得普選權，也創造了勞資協調與社會福利的統合主義機制。最後，新社會運動登場，它所著重的是民主政治與統合主義所無法處理的議題，吸引了不同社會群體的參與。很明顯地，這三組動員議題是相互獨立的。因此，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工人階級也想如法炮製，以相同的方式來對付資產階級；同樣地，在環境與核能議題上，新社會運動挑戰了資本與勞工所組的成長聯盟，而婦女運動更時常批判男性主導的工會文化(Dalton et al.:1990:11)。因此，在三

²訪談紀錄，1999年5月20日。

個階段的社會動員中，存在著明顯的時間和參與形式上之差異性。

然而，台灣與其他先進國家的情形卻大不相同。首先，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之間不存在先後的順序。在 1986 年，鹿港居民組織公害防治協會，反對杜邦公司設置二氧化鈦廠；在同一時間，新竹玻璃公司的員工也以自力救濟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工作權。其次，這兩種運動在當時面對了共同的敵人，也就是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壓制民間社會的威權政府，對於環境權與勞動權同樣不重視，所以不同的運動部門經常相互聲援。最後，除了共同的敵人以外，環境運動與勞工運動也有相同的盟友，政治反對勢力隨時願意尋找挑戰國民黨的舞台。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政治運動與各種社會運動緊密連結在一起，換言之，台灣的政治民主轉型過程不只涉及了政治精英的對抗，同時也促使了民間社會的興起。

簡而言之，遲來的政治民主化使得台灣的社會抗爭呈現不同於西方社會的經驗。無論是「新」或「舊」社會運動，它們在台灣起源脈絡遠比在西方更為複雜，更廣泛地介入威權與民主的鬥爭。基於這一點特殊性，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民間社會興起的政治條件。

2. 突破或是強化既有的政治分歧？

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預測，新政治議題的出現將會打破傳統西方的左右派各佔一端的政治光譜，形成另一種新的對抗軸線。換言之，他們期待新社會運動突破既有的政黨政治體系，集結成一股第三勢力。前西德綠黨的名言：「我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進步派」，最直接地點名了這種新興的性格。然而，在台灣的反核運動發展歷程之中，政治反對勢力的成長與集結則是一個同時發生的現象。伴隨著台灣反核運動的普及化，政治勢力的版圖也在重新劃定，形成威權保守／民主改革、統／獨的兩大陣營。新生的反核運動很快地在政治場域中找到代言人，政治反對勢力願意將反核納入基本的主張，並且高舉這個旗幟來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民進黨與反核運動的匯流是與西方歷史經驗有顯著差別的，因此，可以這麼說，在台灣，反核社會力量的興起是強化了一個正在形成中的政治分歧，而不是突破原有的

政治對抗軸線。

社會運動出現的時機(timing)無疑是重要的。環境、和平、婦女等新社會運動在西方出現時，他們所遇到的是穩定的自由民主體制以及被馴化的工人運動；然而，在台灣，反核人士卻是直接碰觸到威權統治的現實，雖然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是在逐漸減弱之中。時機的問題造成了所謂的「政黨影響力的策略」(strategy of partisan influence)的差異(Dalton1995)：在台灣，反核力量是與一個新興的政治組織進行聯盟；在西方，運動者則是自行組成一個政治組織。換言之，台灣的早期反核運動者面臨的是一個比較開放的政治操作空間，他們有機會可以建立一組政治聯盟關係，以實現反核主張。

事實上，早在國民黨政府宣佈解嚴之前，反核運動與政治反對運動的匯流已經明顯可見。早期的反核知識份子多半與黨外政治人物保持良好的關係，可以直接向這一些新興的權力精英宣傳反核的論述。與林俊義一樣，在台灣反核界輩份頗高的台大張國龍教授與清大黃提源教授就是顯著例子。根據張國龍的說法，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當時黨外政治明星尤清擔任監察委員，其中關於台電核能事故的調查案就是有請教張國龍的專業意見。³同樣地，黃提源曾多次在解嚴前的報刊中撰寫反核文章，也是早期的反核積極份子之一。黃提源在訪談過程中，也不諱言自己與黨外人士的過從甚密，並且也曾應邀參加1986年底的民進黨創黨大會。⁴可以想見的，這些學者必然或多或少地影響了黨外運動對於核能議題的看法。在解嚴之前的黨外政論雜誌中，反核一直是一個重要焦點。黨外人士認為，台灣核能的疑雲與不安全性正好反映了國民黨戒嚴統治的無能。筆者分析1981-1986年間的10種主要的黨外雜誌，一共收集了72篇反核文章(何明修2000:262)，其中有許多篇很可能是直接由這些反核學者所執筆的。從議題討論的密集程度可知，早期的反核知識份子對於政治反對運動在核能議題之態度頗具有影響力。

政治聯盟的形成自然是基於聯盟雙方的意願，透過交換關係來取

³ 訪談記錄，1999年1月30日。

⁴ 訪談記錄，1999年4月20日。

得自己利益的極大化。從黨外運動來看，吸收不同的社會議題、擴大既有的社會對立就是一種累積政治資源的發展策略。誠如學者所指出的，政治反對勢力並沒有執政表現可以作為選舉號召，反對黨傾向於採取意識型態的宣示或承諾(Pizzorno 1981: 251)。從這個角度來看，黨外 / 民進黨採納反核的主張，其實也是有助於強化選舉的競爭力，尤其是要深化其政治改革者的社會形象。因此，在創黨的黨綱中，民進黨明白宣示反對興建新的核電廠，並且要對於既有的核電廠實施更嚴格的管制。同樣地，在創黨後第一次參加的 1986 年立委選舉中，民進黨所提出的共同政見也有這樣一條，「反對任何新設核電廠、環境與消費者權利保衛應優於經濟發展」(引自李筱峰 1987: 247)。根據筆者訪談的了解，黨外人士內部對於社會改革的議題爭議頗多，尤其是涉及勞資關係與社會福利的部分，然而，在制訂反核黨綱的態度上，卻出現了一致的看法。⁵很顯然，早在 1987 年解嚴以及後續的群眾運動出現之前，反核已經成為政治反對派領袖的共識。從民進黨的角度來看，這即是一種運用社會力以達到政治的策略(吳介民 2002)。

簡而言之，早在 1987 年以前，台灣的反核運動就與政治反對運動建立了合作的基礎，解嚴之後的反核群眾抗爭與民進黨合流則是上述歷史條件的邏輯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遲來的政治民主化促成了這一種神奇的組合，使得反核運動進一步深化了發展中的政黨分歧。因此，即使到了政黨輪替之後的今日，我們可以發現「民進黨反核、國民黨擁核」的政治分野。

3. 新的運動價值或是民主化？

西方理論者通常視新社會運動為新價值的代言人，透過集體動員來向公眾傳遞訊息，因此，新社會運動經常被認為是新社會到來的預告。現在我們的問題即是，本土的反核運動是否提出了一個與本土社會現實相異的價值觀？

一方面來說，台灣最早的反核啟蒙者通常是留美歸國的大學教授，他們傾向於「接受西方對於環境的生態學觀點作為其終極目標」

⁵ 訪談記錄，1999 年 6 月 25 日。

(Weller and Hsiao 1994: 12)。由於留美的背景，這一群反核學者認為台灣的環境意識發展很落後，可以透過西方新思潮的引進與推廣，從而開展本土的反核運動。從八十年代初期以來，反核學者紛紛在本土公共領域提出了科技風險、生態學、另類能源開發的論述。在這些被引進來的概念中，前面所提到的「新環境典範」、「後物質主義」，自然是其中所預設的主要價值。解嚴以前的反核論述是以林俊義的《科技文明的反省》(1984)為最主要的代表作，其中收錄了他對於第三世界、農業問題、公害、核能發電等議題的評論文章。對於林俊義而言，現代文明的諸多危機都是來自於「科技中立的神話」，忽略當前的科學已經被政治化、商業化與軍事化的現實。要避免生態環境的惡化，科技的使用要更為謹慎與小心，更要注意所導致的副作用。林俊義指出，他著文反對核能發電的理由之一即是，「國人對科技的迷信是十分普遍，認為任何科技都是會造福人群，增進福祉。這種對科技的誤認常被稱為科學主義(Scientism)」(*ibid.*: 226)。對於八十年代初期的台灣而言，這些論述挑戰了一些社會主流的看法，具有高度的啟蒙作用，至少對於當時的中智階層而言。在這個時期，林俊義與其他反核學者努力扮演一個公共啟蒙者的角色(胡湘玲 1995: 52-53)。

解嚴前的反核知識份子角色是比較接近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期待，他們試圖將國外的新反省帶入本土社會，並且提出一套新的生態學價值。然而，解嚴之後的政治局勢使得運動群眾化，並且開始與民進黨力量結合，整個反核運動的理念訴求也開始有了明顯的轉向。隨著政治自由化的到來，反核運動者開始具有實際的政治參與空間，從過去的紙上反核轉向為街頭反核。反核運動的價值觀自然也跟著改變了，開始與解禁、開放、自主等民主化的議題更緊密地鉤掛鉤。林俊義在 1987 年 4 月的《新環境月刊》登刊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題目即是「反核是為了反獨裁」。在文章中，他強調，核能不只是技術的問題，因為台灣的核電廠是美國被淘汰工業向第三世界強行推銷的結果，其中的決策過程是不透明的黑箱作業，充滿了威權的色彩。因此，他呼籲舉國上下共同形成一股反核力量，「要求我們自己的政府以整體的利益、公開的討論、尊重民意的方式來抉擇核能的政策」(何明修 2000: 92n)。從批判科學主義到反對獨裁，反核運動的路線大幅

度轉變，開始與更廣大的民主化浪潮接合，並且將自身的主張定位為一種「威權與民主」的抗爭。

很顯然，反核運動在解嚴之後的發展朝向更為「政治化」的方向。在此，所謂的政治化是指更依賴於外在政治組織的奧援、更公開介入政黨競爭的戲局、更高層次的抗議對象。反核人士開始更直接涉入選舉，他們不是幫民進黨候選人站台(張國龍)，就是自己成為候選人(例如林俊義與黃提源)。隨著新政治參與空間的開啟，運動者開始將威權主義視為核能決策的始作俑者，因此，只要是打倒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核能風險就能避免。在一篇 1992 年的文章中，林俊義更直接地表達了這種政治觀點。林俊義認為，「民主自由是解決生態危機的必要條件，未來的生態運動一定要政治化」(林俊義 1995: 421)。

從這樣的自我定義來看，政治路線下的反核運動其實是台灣廣泛的民主運動的一個支流，共同與其他的社會力例如民進黨，挑戰威權體制。因此，儘管在整個九 年代之中，反核人士仍是陸續引用西方的生態哲學、土地倫理、科技風險等論述，對抗核電官僚的開發主義價值觀，佔據反核運動領導地位的仍是反獨裁的理念。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說，民主成為了反核運動與其他同時出現的社會抗爭的「主導框架」(master frame)。一方面，運動積極份子運用這種認知框架來說服其他人的參與，另一方面，他們也以這個觀點來界定自身的努力。因此，與其說台灣反核運動試圖在本土社會傳播一套新的環境理念，不如說他們是在深化、拓展一種正在發展中的民主理念。⁶

在此，可以簡單地討論政黨輪替之後的核四爭議。由於民進黨政府的策略失當，廢核四的政治改革宣告失敗，同時更引發了長個四、五個月的政局危機(何明修 2002)。在核四爭議的關頭，民進黨、反核運動者的主要訴求是「非核家園」、「要為後代子孫負責」等本土化的觀念；相對地，擁核人士的主要質疑則是在於供電穩定與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民進黨政府在推動廢核四之前，也舉辦了長達三個月的「核四再評估會議」，原因在於他們認為資訊的真正公開，可以導致更民主的決策。因此，在晚近的這一次爭議中，在朝與在野的反核

⁶ 因此，從運動價值觀來看，台灣反核運動一向是與民進黨密切相關，這即是形成了一種政治交換上的依賴關係(何明修 2003a; Ho 2003)。

人士都是以民主、本土的名義來反對核電，並且沒有超越以往反核運動的訴求內容。這個事實指出這一點，台灣的反核運動長期以來與民主化運動結合，使得兩者在動員框架上呈現高度的重合。

4. 策略或認同

從一開始，台灣的反核運動者就將反核視為台灣民主化的關鍵指標之一。舉例而言，一位反核運動者就如此評論 1994 年的貢寮公投，「展望核四公投應可建立起公共政策民主化決策的模式，反核運動將成為台灣民主化的社會運動」(林碧堯 1994: 201)。與政治民主議題掛鉤的結果，使得反核很快地就與爭取民主的訴求接合，因此與其說反核份子企圖建立一個反核集體認同，不如說他們更重視擁核政策的廢止。或者這樣說，如果反核認同是重要的，那麼它們也是為了終止核四。隨著政治機會的逐步開啟，反核份子開始有機會可以進入新浮現的民主體制，並且採取高度政治化的運動手段。事實上，台灣的核能問題原本即是一個政治決定，制度化成為既定的政策，因此反對者所使用的策略也一直指向國家部門。自從八十年代以來，反核運動的政治策略包括了下列的方式：

(1) 利用地方政府的權限：隨著民進黨在 1989 年底的選舉中取得了台北縣的執政權以來，反核人士一直是與台北縣政府保持合作，透過有限的地方自治權限進行反核。因此，民進黨主政下的台北縣政府拒絕發放核四建照，推薦反核專家進入核四環境影響評估(1991 年)。同樣地，在陳水扁執政下的台北市政府也應反核團體的要求，舉行了核安演習(1996 年)。

(2) 國會遊說：戒嚴以來的首次立法院全面改選是在 1992 年舉行，隨著第二屆國會在此年召開，民進黨的席次大幅增加，使得反核團體獲得了政治遊說的機會。從 1992-1996 年之間，每年立法院的預算審查會期都可以看到反核勢力的動員，他們試圖強化反對黨的反核立場，並且拉攏若干無黨籍與國民黨台北縣籍立委。此外，也由於反核人士的檢舉，監察院在九十年代也通過了三件核四的糾正案。

(3) 核四公投：自從 1994 年以來，反核團體透過民進黨執政縣市

政府的支持，舉行了四場核四公投，分別是貢寮鄉、台北縣、台北市、宜蘭縣。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一直拒絕承認公投的效力，因此，如果沒有民進黨執政首長的行政奧援，公投是不可能舉行的。

(4)選舉輔選與反輔選、罷免：在歷屆選舉中，反核人士不是直接參選，即是組織促選演講團體，幫反核候選人站台。在 1994-5 年，反核團體更曾發動罷免擁核立委的連署活動，一直到國民黨政府拉高罷免門檻之後，才決定放棄。此外，反核團體也多次與其他環境生態合作，共同提出反輔選的候選人名單。

為了採取這些高度政治化的抗爭策略，反核團體長期以來與宣稱反核的民進黨保持合作的關係，因為他們需要民進黨政治菁英的政治資源，也因此，反核運動一向呈現了政黨依賴的狀態。另一方面，由於政黨認同分歧與核能態度分歧的高度重合，使得反核團體也越來越依賴民進黨的支援群眾。在這種資源依賴的情況下，反核團體更能形塑一套獨立於政黨體系的反核認同。

在整個反核運動中，林義雄在 1994 年所組織的核四公投促進會，以及後續一系列的全島苦行有可能是具接近認同建構的運動形式。比較特別的是，林義雄所領導組織是具有高度政治化的運動目標，亦即公投，但是他們卻是採取一種看似十分不政治化的運動路線。苦行是帶有宗教奉獻的色彩，參與苦行是需要服從集體的紀律，不喧嚷、不抽煙、不嚼檳榔，更重要的，苦行參與者特意不展現其威脅性。一個值得分析與探討的問題在於，反核苦行到底形塑出何種的運動認同？如果這個效果的确是存在的話，那麼會不同於先前提到的反威權的反核框架嗎？在此，筆者傾向於認定苦行所訴求的是一種愛台灣、本土化的意識，這也是長期以來與政治民主運動相連結的。換言之，苦行者所特意營造的是「用腳愛台灣」的印象，以襯托出擁核人士的反本土思維。因此，苦行雖然並不直接挑戰政治的或核電的威權主義，但是其運動路線仍是繼承民主運動的香火。

四、 結語：邁向中層次的本土社會運動研究

從以上整理可知，台灣的反核運動，1/沒有在主題與時機上與所謂的「舊社會運動」有差異性；2/不是在突破一個既有的政治社會分歧，反而加以強化；3/與其說是引進一個新的文化價值，不如說是深化既有的理念；4/反核運動是高度的策略取向，而不是以認同形塑為最終的目標。我們的比較結論就是，儘管新社會運動理論十分具有啟發性，但是其背後所預設的時空脈絡，卻與本土的社會情境「水土不服」。同樣的是反對核能使用的推擴，本土的反對運動就是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不符合新社會運動理論的預測。追根究底，原因即是社會運動出現的時機問題，威權與民主體制的背景對比決定了台灣與西方反核運動的差別命運。關於本土社會運動的研究，誠如張茂桂所指出，「理論的發展與有效性，因此是有歷史條件與時空意義的。我們不能用『截長補短』的方式將他們任意整合起來」(張茂桂 1994: 64)。任何的理論模型實質上都預設了時空參考架構，若干論點或許有助於我們釐清本土現象，發掘一些被忽略的面向。但是如果毫無批判性地全盤借用，則必然面臨方納圓鑿、扞格不入的困境。歐洲的研究者當然有權以本土社會運動事實來建構一套理論模型，但是對於學術後進的我們而言，更謹慎地、更具選擇性與批判性地採用理論觀點，才是最安全的研究策略。

筆者相信，謝國雄對於具有「台灣味」的社會學之堅持是所有本土化研究者的目標。謝國雄指出，「作為一個研究台灣社會的『台灣』社會學家，最大的願望是回答『台灣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及進一步，『台灣社會有什麼特殊性？』這一個大哉問)(謝國雄 1997: 347)。對於特殊性的注意當然是透過學習與比較而來的，本土社會事實之所以特殊，正是因為它與西方理論的預測有所不同。Peter Berger曾經指出，社會學帶來的第一項智慧，就是「事物並不是看起來的那樣子」(Berger 1966)。作為本土的社會研究者，我們也應有更加一層認識，「本土事物不是西方理論看起來的那樣子」。

在本文中，我們試圖比較台灣的反核運動與新社會運動理論。然而，光是指出本土社會運動與外國某一種理論不符合，當然是不充份的工作，下一步的研究議程應該是重新理論化本土的現象，並且明白地指出台灣與其他地區的差異性。在我們的分析之中，一個關鍵性的差異就是歷史條件的不同。橘逾淮為枳，從西方引進的反核理念，卻是本土社會中開展出不同的風貌。出現於一個民主與威權激烈鬥爭的年代之中，反核運動的發展也很難避免受到佔據社會主導地位的時代精神之影響。問題並非在於不同文化的本質差異，而是不同的歷史條件所導致的路徑依循。在本土的企業組織、勞動體制、經濟發展、派系政治等研究領域上，許多學者都已經開始更深刻地注重本土社會的歷史情境，筆者相信，在社會運動的研究領域中，未來的發展性是值得期待的。

參考文獻

- 何明修 (2000)《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以台灣的環境運動為例 (1986-1998)》，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01a)「溝動行動理論與市民社會」，《社會理論學報》，4：147-176。
- (2001b)「台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草根(1980-1986)」，《台灣社會學》2：97-162。
- (2002)「為何民進黨政府的廢核政策失敗？社會動員、改革機會政治策略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6：86-137。
- (2003a)「自主與依賴：比較反核四運動與反美濃水庫運動中的政治交換模式」，《台灣社會學刊》30：1-49。
- (2003b)「政治民主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1993-1999)」，《台灣社會研究期刊》50：217-250。
- 吳介民 (2002)「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4：159-198。
- 李丁讚、林文源 (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198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133-206。
- 李筱峰 (1987)《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
- 林俊義 (1984)《科技文明的反省》，台北：帕米爾書店。
- (1995)「民主自由是解決生態危機的必要條件」，收於《台灣生命的心聲》，鄭先祐編，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418-421。
- 林碧堯 (1994)「台灣的反核運動」，收於《核四決策與輻射傷害》，鄭先祐編，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183-202。
- 胡湘玲 (1995)《核工專家 vs 反核專家》。台北：前衛。
- 徐正光 (1991)「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收於《社會重建》，祝萍編，台北：時報，頁 29-47。
- 張俊宏等 (1989)《到執政之路》，台北：南方出版社。
- 張茂桂 (1989)《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 (1994)「民間社會、資源動員與新社會運動：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志向」，《香港社會科學報》4：33-66。
- 張茂桂等 (1992)《民國七十年代台灣地區「自力救濟」事件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

- 機器戰警 (1991)《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台北：唐山出版社。
- 蕭新煌 (1989a)《社會力：台灣向前看》，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
- (1989b)「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分析架構」，收於《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徐正光、宋文里合編，台北：巨流出版社，頁 21-46。
- (1990)《台灣未來的趨勢》，台北：社會大學出版社。
- 蕭新煌等 (1995)「百年來台灣社會力的沈浮與轉型」，收於《百年來的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110-149。
- 謝國雄 (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Bello, Walden and Stephanie Rosenfeld, 1990, *Dragons in Distress: Asian Economies in Crisis*, San Francisco: The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 Berger, Peter, 1966,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New York: Doubleday.
- Calhoun, Craig, 1993, “‘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 385-427.
- Cohen, Jean L.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 663-716.
- Cohen, Jean L. and Andrew Arato, 1994,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ohen, Jean L., 1982, “Between Crisis Management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Place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elos* 52:21-40.
- Dalton, Russell J. et al., 1990, “The Challenge of New Movements,” in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ed.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3-20.
- Dalton, Russell J., 1995, “Strategies of Partisan Influence: West European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London: UCL Press, pp.296-323.
- Eder, Klaus, 1982, “A New Social Movement?” in *Telos* 52:5-20.
- Gorz, André, 1982, *Far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trans. by Michael Sonenscher, London: Pluto Press.
- Gurr, Ted Robert,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75,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trans.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Inglehart, Ronald, 1981, "Post-Materialism in an Environment of Insecurity,"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880-900.
- Keane, John (1984) "Introduction," in Offe (1984), pp. 11-34.
- Kitschelt, Herbert, 1990,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Organization," in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s.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Oxford: Polity Press, pp.179-208.
- Kornhauser, William, 1959,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 Kriesi, Hanspeter, 1988, "The Interdependence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349-368.
- , 1999, "Movements of the Left, Movements of the Right: Putting the Mobilization of Two New Types of Social Movements into Political Context,"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eds. by Herbert Kitschelt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17-345
- Le Bon, Gustav, 1995, *The Crowd: A Study of Popular Mind*, 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87, *Social Movement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Melucci, Alberto, 1988,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ed. by John Keane, London, Verso, pp.245-260.
- , 1994, "A Strange Kind of Newness: What's 'New'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Enrique Laraña et al..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 101-130.
- ,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lbrath, Lester W., 1984, *Environmentalists: Vanguard for a New Society*, Albany: NY: SUNY Press.
- Ho, Ming-sho, 2003, "The Politics of Anti-Nuclear Protest in Taiwan: A Case of Party-Dependent Movement (1980-2000),"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37: 683-708.
- Offe, Claus, 1984, *Contradic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ed. by John Kea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 1990, "Reflect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Self-Transformation of Movement Politics: A Tentative Stage Model," in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eds.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Oxford: Polity Press, pp.232-250.
- Pizzorno, Alessandro, 1981, "Interests and Parties in Pluralism," in *Organiz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 Pluralism, Corporat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s*, ed. by Susanne Ber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49-286.
- Rucht, Dieter, 1988, "Themes, Logics, and Arenas of Social Movements: A Structural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305-328.
- Smelser, Neil J.,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avid A. et al.,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64-481.
- Tarrow, Sidney, 1989a,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7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 1989b, *Struggle, Politics, and Reform: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Cycles of Protest*, Western Societies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 No.21,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 Touraine, Alain, 1977, *The Self-Production of Society*, trans. by Derek Coltma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 1985,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hange*, ed. by Orlando Fals Borda, London: Sage, pp.77-92.
- , 1986, "Unionism as a Social Movement," in *Union in Transition: Entering the*

Second Century, eds. by Seymour Martin Lipset, San Francisco, C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p. 77-92.

——, 1999, “Neo-Modern Ecology,” in *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16:2, 49-51.

Wagner, Peter, 1994,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their Social Contexts: Society and Polity in Western Europe before and after 1970,” in *States and Anti-Nuclear Movements*, ed. by Helena Fla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27-33.

Weller P. Robert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1994, “Culture, Gender and Community in Taiwan’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Asi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and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Leiden, 27-29 October, 1994.

When a Taiwan's Social Movement Meets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he Case of Anti-Nuclear Movement

Ming-sho Ho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studying social movements. The Taiwanese anti-nuclear movement is taken as a critical case to reflect on the Theory of New Social Movement (hence, NSM). According to the NSM theory, new social protests after 60s are different in nature from the previous ones. New issues arise because of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late capitalism. The new politics presents a new social cleavage alongside the old one. Communitarianism, life ethics, postmaterialism are the new collective values. However, in the Taiwanese contest,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 is a byproduct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rather than late capitalism. The anti-nuclear forces are aligned with the opposition party, and view their effort as ext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Henc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NSM theory in Taiwan is quite limited. Further scholarship on Taiwanese social movement should take more attention on the indigenous factors.

Keywords: 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ti-nuclear Movement, Political Cleavage, Democratization.